

# 东南亚和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周玉端 李英华

关键词：和平文化 东南亚 华南 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 功能技术复合体

KEYWORDS: Hòa Bình Culture (Hoabinhian) Southeast Asia South China Late Pleistocene-Early Holocene Functional Technocomplex

ABSTRACT: Hòa Bình Culture (Hoabinhia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epochs. The researches on it have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from the discovery and nomination in the 1920-1930s, via the constant expansion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scopes in the 1960-1970s and the retrospection of the academic field to the past researches in the 1980-1990s, down to the in-depth research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es on the Hòa Bình Culture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and replacemen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 China and the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from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epoch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Hòa Bình Culture and the summarization of its new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 引言

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sup>[1]</sup>是东南亚地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广泛分布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现象”，也是该地区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自20世纪早期被发现、命名，到今天，其年代、性质及相关的古人类文化、行为、生计等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早期中外研究者曾意识到，北纬30度以南的中国南方地区与东南亚在史前文化方面关系密切<sup>[2]</sup>，尽管此前已有中国学者对和平文化进行过介绍<sup>[3]</sup>，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和研究范式的差异等，我们对和平文化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纪末。21世纪以来的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需

要我们改变对和平文化内涵、时空范围及源流等问题的认知。本文在梳理20世纪和平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了21世纪研究的新进展，希望对华南<sup>[4]</sup>和东南亚地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类似遗存的比较研究有所裨益。

## 一、20世纪和平文化的研究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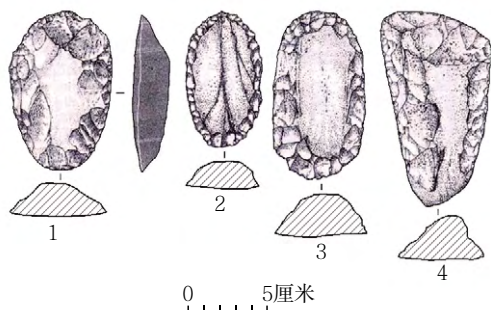
### （一）20~40年代

东南亚国家的现代考古学是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sup>[5]</sup>。20世纪20年代，以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在越南北部喀斯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和平省（Hòa Bình）发现了大约60个洞穴遗址<sup>[6]</sup>。基于对

作者：周玉端、李英华，武汉市，430072，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这些遗址的研究，1932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一次远东大会上，科拉尼正式将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命名为和平文化，并把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由原始手段加工而成的各种形态的工具所构成的文化，其特征为单面加工而成的石工具、石锤、剖面呈亚三角形的工具、圆盘、短斧、杏仁状的工具等，常出土有骨器<sup>[7]</sup>。所谓单面加工的石工具，就是“苏门答腊式石器”（Sumatralith）。这种石器是在砾石上进行单面修型（façonnage/shaping）和加工（retouch）而成（图一），它在苏门答腊岛发现而被命名<sup>[8]</sup>。短斧（short-axe）是指单面或双面制成的砾石工具，刃缘陡峭，类似斧，但有一个横向扁平的面，这个面可能为特意制成，也可能是更大的石斧断裂而成<sup>[9]</sup>（图二）。

关于和平文化的年代，科拉尼曾认为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但由于出土的动



图一 和平文化苏门答腊式石器（引自Zeitoun V. et al. 2008. *Préhistoires au sud du Triangle d'or*. IRD Éditions）

1.LB1303 2.LB1362 3.G24 4.ACD362



图二 和平文化短斧（引自Shoocongdej R. Forager, Mobility Organization in Seasonal Tropical Environments of Western Thailand. *World Archaeology*, 2000,32(1)）

物遗存都属于全新世现生种，因而她后来又改变看法，认为和平文化始于全新世早期。当时学者均认为和平文化应属早于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文化<sup>[10]</sup>。科拉尼凭借石器类型学方法所揭示出的和平文化的特征成为一个范例。然而此后，人们判断遗存是否属于和平文化却极少根据她当初所划分的28个石器类型，而仅仅依据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有无<sup>[11]</sup>。

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由欧洲人主导，他们直接使用欧洲已有的分期框架，将和平文化归为中石器时代，并基于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模式，将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欧洲旧石器类型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标准化石法）被用来定性遗存和遗址，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 （二）40~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新的考古发现使得和平文化的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发现<sup>[12]</sup>，有学者认为在日本中部也有分布<sup>[13]</sup>。60~70年代又发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遗址，以柬埔寨莱昂斯宾遗址（Laang Spean Cave）<sup>[14]</sup>和泰国仙人洞（Spirit Cave）遗址<sup>[15]</sup>为代表。新的发现与研究引发学术界对和平文化的重新定义。海德（Karl G. Heider）早在1958年就提出使用“复合体”（complex）来代替“文化”<sup>[16]</sup>，认为将这种砾石工具命名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是没有依据的<sup>[17]</sup>。马修斯（John M. Matthews）也尝试重新定义和平文化，不过他仍然认为和平文化是一种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它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工具主要由砾石直接加工而成，是一种中石器文化，没有农业的证据，但是可能有陶器<sup>[18]</sup>。正式使用“和平复合体”（Hoabinhian Complex）概念的是戈尔曼（Chester F. Gorman），他认为和平文化不应是东南亚地区中石器时代

的同义词，并根据泰国仙人洞遗址发现的新资料重新定义了和平文化，戈尔曼不仅考虑石制品，还加入了生态环境的参数<sup>[19]</sup>。受克拉克（David L. Clarke）“技术复合体”（Techno-complex）概念的启发，戈尔曼认为和平文化现象反映的是东南亚地区早期人类对湿热生态环境的共同适应，它是一种技术复合体，而非一种时空范围如此之大的考古学文化，和平技术复合体可能包括多种考古学文化<sup>[20]</sup>。根据戈尔曼与怀特（Joyce C. White）对泰国潭帕占（Tham Phaa Chan）遗址的研究，他们还否定了和平石器工具“无定形”（Amorphous）的说法，强调了工具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并用“剥片序列分析法”（Lithic Reduction Analysis）重新定义了和平文化，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石器工业类型<sup>[21]</sup>。此时，东南亚本土考古学者开始成长。越南学者将和平文化视作一种考古学文化，主要关注它的源流、发展阶段及时空范围，对和平文化的时空范围被随意扩展表示不满，认为和平文化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越南北部才是其范围<sup>[22]</sup>。泰国学者以朴卡炯（Surin Pookajorn）为代表，为回答和平文化究竟是一种考古学文化还是技术复合体的问题，他借助民族学的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sup>[23]</sup>。

总之，这一阶段有些学者开始质疑套用欧洲分期方案的合理性<sup>[24]</sup>并提出新的分期方案<sup>[25]</sup>，开始关注遗址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信息<sup>[26]</sup>，石器研究的方法也开始转变。这些都为后来学术界重新定义和平文化与深刻反思埋下了伏笔，所以此阶段既是和平文化研究的发展期，也是一个过渡期。

### （三）80~90年代

20世纪最后20年，新的遗址的发现再次扩大了和平文化的时空范围，如越南塔姆空洞穴（Tham Khoung Cave）遗址和平文化的测年达距今3万年以上<sup>[27]</sup>。另外，尼泊尔和印度东北部也发现了典型的和平文化的石制品<sup>[28]</sup>。

80年代末，学术界对和平文化性质的

认识仍然存在分歧。泰国学者曾拒绝使用“和平”（Hoabinhian）这一术语<sup>[29]</sup>，可视作本土学者对和平文化研究的极端否定，而越南考古学界对于和平文化的讨论仍然集中在文化史层面<sup>[30]</sup>。90年代最先对和平文化研究做出反思的是雷诺兹（Tim Reynolds）。他认为和平文化现象存在一个核心区，包括越南、泰国和马来半岛，其周边地区存在多个相似的石器工业，如中国的华南、澳大利亚和尼泊尔等；和平文化的石器需要在“组合”与“工具”两个层面上进行讨论；他对“和平”这一术语产生怀疑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过于重视工具而忽略其他石器产品，与环境相关的资料也收集得不够系统，因此“和平”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东南亚地区史前史的作用很有限，它必须得到修改或者直接抛弃<sup>[31]</sup>。1993~1994年在越南河内召开“和平文化发现60周年大会”，与会学者对和平文化达成如下共识：1.“和平”这个概念应该保留；2.“和平”是指一种石器工业，而非文化或技术复合体；3.和平石器工业的年代跨度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4.“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概念需要保留；5.和平石器工业应该指中砾工具工业而非细砾工具工业；6.和平石器工业不是中石器时代的现象。和平石器工业的特点、遗址特征和分布范围也在这次会议上被重新界定。在石器工业特点方面，它的工具组合中一般会出现少数使用石片，工具单面加工，包括苏门答腊式石器、短斧、端刮器、边刮器、刮刀、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的工具。和平遗址的上文化层一般都会出现陶片，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澳大利亚、中国南部和尼泊尔也存在相似的石器工业类型<sup>[32]</sup>。将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石器工业类型标志着和平文化研究的转折，即从文化史的构建中解脱出来，并为后来不同背景的研究者进一步揭示该石器工业内部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次会议上依然有人坚持使用“中石

器”、“文化”和“技术复合体”等概念<sup>[33]</sup>，尤其是一些越南学者对考古学文化情有独钟，导致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思维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是文化历史学派的残留<sup>[34]</sup>。类型学仍然是石器研究的主要方法，过程主义考古学所关注的功能、生态、适应等问题也因相关考古学家的参与而得到更多研究。为解决和平石器工具功能的问题，实验考古的方法也得以初步运用<sup>[35]</sup>。

## 二、21世纪和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21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考古项目，并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合作<sup>[36]</sup>，这些研究项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和平文化。在新考古发现和新研究方法推动下，学术界对于和平文化的认知也取得了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新发现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目前越南发现的和平文化遗址的数量已超过140个，集中分布在和平省及周边省份<sup>[37]</sup>，另外泰国发现了32个，马来半岛有10多个<sup>[38]</sup>，老挝有10个<sup>[39]</sup>，柬埔寨有2个明确的和平遗址<sup>[40]</sup>，印度尼西亚有6个，菲律宾有3个<sup>[41]</sup>，尼泊尔有3个<sup>[42]</sup>，印度北部近年又在多处遗址的地表采集到类似和平石器工业的工具<sup>[43]</sup>。中国云南新发现和和平文化遗址——硝洞，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明确的和平文化遗址，它使得和平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展<sup>[44]</sup>。

其次，新的测年为典型和平文化遗址构建了坚实的年代框架，并在源流、传播方向等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平遗址虽然发现较多，但是有明确地层和测年数据的并不多。从已有资料看，东南亚大陆和平遗址的年代范围多在距今30000~3000年之间<sup>[45]</sup>。在越南的140多个和平文化遗址中，经过AMS-碳十四测年的仅有20余个，年代集中在距今18000~7000年<sup>[46]</sup>。近年，柬埔寨莱昂斯宾洞

穴重启发掘工作，新测出和平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1000~5000年<sup>[47]</sup>；泰国塔姆罗德岩厦（Tham Lod Rockshelter）遗址典型和平石器工具出现的年代为距今约26000年<sup>[48]</sup>，而怀欣（Huai Hin）露天遗址和平石器工具所在的层位距今仅3700年<sup>[49]</sup>；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第一个和平文化洞穴遗址——同吉拉德哈哇洞穴（Tögi Ndrawa Cave）的测年为距今约1.2万年，改写了和平文化在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时间<sup>[50]</sup>。最近云南硝洞遗址发现了明确的和平文化石器工具，AMS-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可达4.3万年前，是目前亚洲所知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存<sup>[51]</sup>。另据报道，在澳大利亚西南部马里马普（Malimup）遗址发现了距今约200年的“典型和平石器”<sup>[52]</sup>，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发现的所谓“典型和平石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东南亚大陆和平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它们更可能是石器打制技术趋同的表现，而不能仅仅依据数件单面加工的砾石工具就将其归属于和平文化。

再次，运用新的技术和技术-功能分析方法<sup>[53]</sup>，法国学者辨识出和平石器工业的多种操作链（Chaîne Op é Ratoire），并重新定义了和平文化，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与解释奠定了基础。以怀欣露天遗址为例，此处新发现的和平石器工业包含三种操作链。第一种操作链是在两面结构为平-凸的长形砾石上进行单面修型和加工，最终获得苏门答腊式石器；具体步骤是先寻找形态与成品接近的砾石原料，然后以砾石的平面为基础面，凸面为工作面，在两长侧边进行修型——打下一定数量的预设石片和中间石片以凸显两端，从而形成端刃的基础形态，最后在两端通过“预锐化”和“锐化”的加工以获得刃口——使用功能单元（UTF CT）和持握功能单元（UTF CP）（图三，1）。第二种操作链是在短而厚的椭圆状砾石上进行修型，并加工其刃缘部分，最终获得砍砸器（图三，2）。第三种操作链是整合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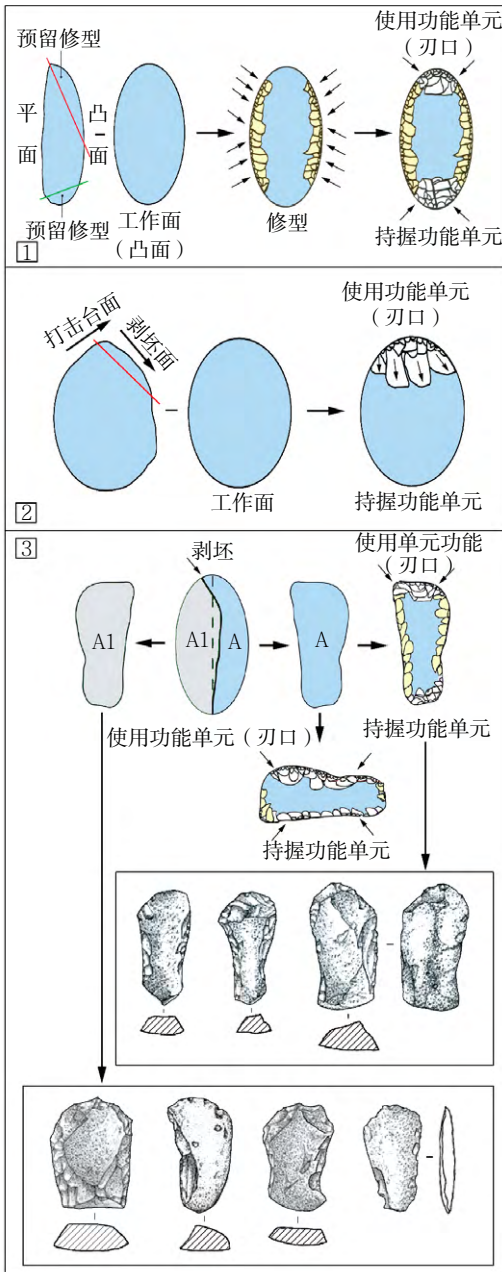
坯和修型概念，首先将原料剥坯，破裂成两个半块砾石（A、A1），然后在半块砾石上修型和加工，最终获得边刮器或横刃刮削器（图三，3），工具刃口有时会出现两面加

工（bifacial retouch）的情况<sup>[54]</sup>。这种操作链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其实在很多遗址中这种操作链产品的比例远高于苏门答腊式石器，比如硝洞、怀欣和莱昂斯宾遗址。它对石器原料的利用很充分，打制技术也相对简单。需要说明的是，和平石器工业生产的操作链可能并非仅此三种，随着新方法的广泛运用，其多样性会不断被揭示出来。由于这种方法主要是从技术和功能的角度复原与解释石器工业生产的共性及多样性，而非仅仅根据典型器物的有无，因而学者倾向于将其定义为一种“功能技术复合体”（Functional Technocomplex）而非考古学文化。

最后，对和平石器工业的技术传统与气候、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怀特认为和平石器技术传统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它能充分满足当时人类的需要，她发现和和平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亚洲木本竹类丰富区的分布区域与亚洲季风性气候的分布区域有着较大重合，由此推测和平石器工具的主要用途是加工竹木，和平石器技术的持续存在反映的是人类对竹类资源的强化利用<sup>[55]</sup>。马维克（Ben Marwick）则侧重从行为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和平文化，他通过对泰国西北部两处遗址石制品的分析和古环境重建，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史前文化一样，气候变化和资源远近也是影响和平石器技术的重要因素<sup>[56]</sup>；他还对和平石器技术的起源做了推测，认为它的出现可能与南亚地区发现的“似勒哇娄瓦放射状打制策略”（Levallois-like Radial Reduction Strategy）有一定的亲缘关系<sup>[57]</sup>。

### 三、结 语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从一种考古学文化变为一种技术复合体，从一种技术复合体变成一种石器工业类型，再到这种石器工业类型的三种典型操作链的揭示，学术界对于和平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图三 泰国怀欣遗址发现的和平工业的三种操作链及其产品（1、2引自Zeitoun V. et al. *Préhistoires au sud du Triangle d'or*.IRD Éditions, 2008 3.引自Forestier H. et al. *The Open-air Site of Huai Hin (Northwestern Thailand) : Chron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Hoabinhian. Comptes Rendus Palevol*, 2013,12(1)）

程。当前和平文化的年代框架更加坚实，空间范围更加明确，研究方法也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理论也更加多元化，这是考古学、更是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地理十字路口，东南亚地区在东亚、南亚、澳洲等邻近地区古人类迁移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显而易见。因此，和平文化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对这些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和平文化研究史和当前研究状态看，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也代表着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和平文化的定义亟需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由于学术背景各异，目前学者虽然都用“和平”一词，但所指却未必相同。当前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是和平文化发现60周年大会的重新定义，不过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有无仍然是很多学者判断遗存是否为和平文化的唯一依据。法国学者将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功能技术复合体，这实际上是以石器打制者的操作程式（schème opératoire）或认知模式为标准，从技术的微观层面揭示遗址石器工业体系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随着更多和平遗址石器工业操作链的复原，它们在时空维度上的宏观差异或共性也能逐渐明晰，并最终带来“和平”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由于这种方法关注的是石器工业在技术、功能和认知层面上的特征，而非特定的文化因素，因而在解释过程中避免了将技术特征与某种史前人群直接关联的做法。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路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揭示出不同遗址的操作程式后，它们与原先关于和平文化的定义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对接问题，比如，当“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操作链缺乏或不典型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将其归入和平文化的范畴？它是应该归入一个新的技术体系，还是可以解释为和平功能技术复合体的区域多样性呢？

相信随着新的理论方法的不断运用，和平文化的内涵也会越来越清晰。

第二，和平石器技术的起源、传播与变迁以及这些现象与东南亚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现代人群迁移、交流及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研究。虽然马维克对和平石器单面打制技术的起源提出了假设，怀特对技术的传播方向做出了由北向南的推测<sup>[58]</sup>，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和平文化现象与东南亚地区史前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sup>[59]</sup>，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明确。全新世中期，和平文化洞穴遗址的上文化层往往可见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土著人群与新来人群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平文化晚期的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sup>[60]</sup>。由于东南亚考古资料的特点和学术界的某些偏见，目前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及其行为特征的研究一直难以将和平文化所在的东南亚地区纳入讨论范围，如果能深入探索和平功能技术复合体的特征及其背后的诸种动因（如环境、气候、文化等），则有可能为晚更新世晚期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或行为的发展演化提供新的诠释。

第三，和平文化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分布情况尚不明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虽然很多早期研究都曾提到华南地区可能存在和平文化遗存以及似苏门答腊式石器<sup>[61]</sup>，但是零星的发现和建立在类型学基础上的模糊印象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也难以引发更深层面的讨论。而云南硝洞遗址发现目前所知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存，证明中国的资料在解决和平石器工业的技术起源与传播等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重新界定华南那些疑似和平文化的资料必定会厘清和平石器技术在东南亚以北的分布情况，从而为讨论两地史前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奠定基础。

和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止上

述几个,但是未来的工作一定会紧紧围绕这些最为基础的问题展开,其中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即“从技术的角度重新定义和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一步”<sup>[62]</sup>。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人类技术行为进行复原和解释,并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比较其共性和多样性。

附记: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Hubert Forestier教授曾多次与作者深入讨论并解答了对和平文化定义的疑惑,西澳大学考古系Sandra Bowdler女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Joyce C. White教授和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Ben Marwick博士均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特致谢忱!

### 注 释

- [1] “和平文化”英文为Hoabinhian Culture,国外学者通常仅以Hoabinhian或Hoabinhien(法文)行文。由于研究范式的差异以及学术界对和平文化不断的重新定义,不同学者虽然都使用“Hoabinhian”,但是所指却有所不同。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使用“和平文化”,并将其理解为和平石器工业或功能技术复合体,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现象”,而非指一种具体的考古学文化。
- [2] a.凌纯声:《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新生报》(民族学研究专刊)1950年第3期。  
b.Solheim II W. G., Reworking 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15, pp.125-139.1969.
- [3] a.戴国华:《论东南亚“和平文化”及其与华南文化的关系》,《东南亚》1988年第1期。  
b.童恩正、卡尔·L·赫特勒:《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c.王幼平:《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旧石器工业的比较》,《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 [4] 本文“华南”主要指两广、云南、海南、福建、台湾等靠近东南亚大陆及岛屿的中国南方地区,北可达江西、湖南和贵州的南部地区。
- [5] Shoocongdej R.,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as a Global Dialogue: Reflections from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Archaeologies: A Sociological View of the Science of the Past*, pp.707-729, Springer, 2011.
- [6] a.Colani M., Découverte d'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ans La Province De Hoa-Binh, Tonkin, *L' Anthropologie*, 36, pp.609-611. 2011.  
b.Colani M., L' age de la Pierre dans la Province de Hoa-Binh (Tonkin), *Mémoires du Service Géologique de l' Indochine*, 14(1), pp.1-86.1927.  
c.Colani M., Quelques Paléolithes Hoabinhiens Typiques De l' Abri Sous Roche de Lang-Kay,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26(6), pp.353-384. 1929.
- [7] Matthews J. M., A Review of the 'Hoabinhian' in Indo-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9, pp.86-95. 1966.
- [8] Forestier H., Zeitoun V., Seveau A., et al., Prospections Paléolithiques et Perspectives Technologiques Pour Redéfinir le Hoabinhien du Nord de la Thaïlande (Campagnes 2002-2005), *Aséanie*, 15, pp.33-60.2005.
- [9] 同[7]。
- [10] a.Saurin E., Les 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au Cambodge, Laos, et Viet Nam (1877-1966), *Asian Perspectives*, 12, pp.27-41.1969.  
b.Solheim II W. G., The Hoabinhian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Regional Seminar on 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p.19-26. 1974.
- [11] a.Zeitoun V., Forestier H., Nakbunlung S., et al., *Préhistoires au Sud du Triangle d'Or*, IRD Éditions.2008.  
b.White J. C., Gorman C. F., Patterns in 'Amorphous' Industries: the Hoabinhian Viewed through a Lithic Reduction Sequence,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Wilhelm G. Solheim II *Festschrift*.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Press, pp.411-441.2004.
- [12] Matthews J. M., The Hoabinhian Affinities of some Australian Assemblages, *Archaeology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 1(1), pp.5-22.1966.
- [13] Maringer J., Some Stone Tools of Early Hoabinhian Type from Central Japan, *Man*, 57, pp.1-4.1957.
- [14] a. Mourer C. E. C., Mourer R. La coupe à pied annulaire de Laang Spean, Phnom Teak Trang, Province de Battambang, Cambodge, *Bulletin de la*

-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Mensuelles*, 68(5), pp.156–158.1971.
- b. Mourer C. E. C., Mourer R. The Prehistoric Industry of Laang Spean, Province of Battambang, Cambodia, *Archaeology &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 5(2), pp.128–146.1970.
- c. Mourer R., Laang Spean and the Prehistory of Cambodia, *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3, pp.29–56.1977.
- d. Mourer C., Mourer R. Prehistoric Research in Cambodia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Asian Perspectives*, 14, pp.35–42, 1971.
- [15] Gorman C. F., Excavations at Spirit Cave, North Thailand: Some Interim Interpretations, *Asian Perspectives*, 13, pp. 79–107.1970.
- [16] Heider, K. G., A Pebble-Tool Complex in Thailand, *Asian Perspectives*, 2(2), pp.63–67.1958.
- [17] Heider K. G.,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Kanchanaburi, *Journal of Siam Society*, 45, pp.62–70.1957.
- [18] 同[7]。
- [19] Gorman C. F., Hoabinhian: A Pebble-Tool Complex with Early Plant Associ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cience*, 163(3868), pp.671–673.1969.
- [20] 同[15]。
- [21] 同[11]b。
- [22] 黄春征著, 范全迎译:《关于和平文化阶段》, 见《考古学参考资料》第5辑, 文物出版社, 1982年。
- [23] Pookajorn S., Hoabinhian Cave Excavations in Ban Kao District, West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86.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in Western Europe*, pp.11–27. 1990.
- [24] Hutterer K. L., Allen J., Arutiunov S. A., et a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ultural Sequence and Comments and Reply, *Current Anthropology*, 17(2), pp.221–242.1976.
- [25] Solheim II W. G., Northern Thailand, Southeast Asia, and World Prehistory, *Asian Perspectives*, 13, pp.145–158.1970.
- [26] a.同[15]。  
b.同[19]。
- [27] Pautreau J., Le Hoabinhien, 60 ans Après Madeleine Colani,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91(3), p.175.1994.
- [28] a.Sharma T. C., Discovery of Hoabinian Cultural Relics in North-east India, *Adaptation and Other Essays: Proceedings of the Archaeological Conference, 1988*.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Research Publications, pp.136–139.1990.  
b.Corvinus G., The Patu Industry in Its Environment in the Siwaliks in Eastern Nepal, *Quartär*, 39(40), pp.95–123, 1989.
- [29] Santoni M., Pautreau J., Prishanchit S., Excavations at Obluang, Province of Chiang Mai,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86.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in Western Europe*,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61,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pp.37–54.1990.
- [30] a.Tan H. V., Different Lines of Post Hoabinh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Stone Age of Vietnam, *Anthropologie*, 99(4), pp.652–666.1995.  
b.Chu V. T., Dates and Developing Stages of Hoabinhian Culture, *Khao Co Hoc*, (1–2), pp.66–72.1984.
- [31] Reynolds T. E. G., The Hoabinhian: a Review, *Bibliographic Review of Far Eastern Archaeology*, Oxbow Books, pp.1–30. 1990.
- [32] Moser J., The Hoabinhian Definition–In the Past and Today: A Short Historical Review of Defining the Hoabinhian, *Crossing Border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1, pp.3–12, NUS Press, Singapore. 2012.
- [33] 同[27]。
- [34] Marwick B., Stone Artefacts and Recent Research in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n Hunter-gatherers, *Before Farming*, 4, pp.1–19.2008.
- [35] Jérémie S., Vacher S., Le Hoabinhian en Thaïlande,



- Un Exemple D'approche Expérimentab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79, pp.173-209. 1992.
- [36] 这些项目包括2002~2005年泰-法“金三角南部地区的史前考古”、2001年开始的泰国“高地考古”、2005年开始的老-美“湄公河中游考古”、2009年开始的柬-法“莱昂斯宾洞穴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1999~2009年越南独立开展的“和平文化深入研究课题”以及2004年与日、澳等国组成联合考古队等。
- [37] a.Chung T. N., Research on Hoa Binh Culture in Viet Nam, Laos and Cambodia, *Vietnam Archaeology*, 3, pp.19-32.2008.  
b.Yi S., Lee J., Kim S., et al., New Data on the Hoabinhian: Investigations at Hang Cho Cave, Northern Vietnam,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8, pp.73-79. 2008.
- [38] 蒋远金:《广西洞穴遗址——兼论西江-珠江流域中石器时代》,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
- [39] a.同[11]a。  
b.同[37]a。  
c.White J. C., Bouasisengpaseuth B., Archaeology of the Middle Mekong: Introduction to the Luang Prabang Province Exploratory Survey, *Recherches Nouvelles sur le Laos*. 8, pp.37-52, Publica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Paris. 2008.  
d.SU N. K.,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Vietnam, Laos and Cambodia, *Vietnam Archaeology*, 3, pp.7-18. 2008.  
e.Patole-Edoumba E., Durringer P., Richardin P., et al., Evolution of the Hoabinhian Techno-Complex of Tam Hang Rock Shelter in Northeastern Lao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3(4), pp.140-157.2015.
- [40] a.Forestier H., Sophady H., Puaud S., et al. The Hoabinhian from Laang Spean Cave in Its Stratigraphic, Chronological, Typo-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 (Cambodia, Battambang Provin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3, pp.194-206. 2015.  
b.Sophady H., Forestier H., Zeitoun V., et al., Laang Spean Cave (Battambang province): A Tale of Occupation in Cambodia from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16, pp.162-176, 2016.  
c.Sophady H., A Study of Polished Stone Tools from Samrong Sen, Cambodia: the French Museum Collections. *Museologia Scientifica e Naturalistica*. Volume speciale, pp.87-90.2008.
- [41] 同[11]a。
- [42] a.Hazarika M., Lithic Industries With Palaeolithic Elements in Northeast Indi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69, pp.48-58.2012.  
b.Zoller L., Chronology of Upper Pleistocene 'red Silts' in the Siwalik System and Constraints for the Timing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Nepal, *Catena*, 41(1), pp.229-235.2000.  
c.Hazarika M., Prehistoric Cultural Affiniti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Northeast India: An Exploration, *Unearth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pp.16-25.2013.
- [43] a.Gaillard C., Singh M., Malassé A. D., Late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Lithic Industries in the Southern Fringes of the Himalay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29 (1-2), pp.112-122. 2011.  
b.Sharma S., Southeast Asian Elements i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Northeast India, *SPAFA Journal*, 20(3), pp.19-30.2010.  
c.Soni A. S., Soni V. S., Rekhi S. S., New Types of Stone Tools Found in Soanian Regime of the NW sub-Himalayas of India, *Human Biology Review*, 3 (1), pp. 60-87.2014.
- [44] Ji X., Kuman K., Clarke R. J., et al., The Oldest Hoabinhian Technocomplex in Asia (43.5 ka) at Xiaodong Rockshelter, Yunnan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00, pp.166-174.2015.
- [45] Zeitoun V., Forestier H., Pierret A., et al., Multi-millennial Occupation in Northwestern Lao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Excavations at The Ngeubhinh Mouxeu Rock-shelter, *Comptes Rendus Palevol*, 11(4), pp.305-313.2012.

- [46] 同[37]a。
- [47] 同[40]a。
- [48] a.Chitkament T., Gaillard C., Shoocongdej R., Tham Lod Rockshelter (Pang Mapha District, North-western Thailand): Evolution of the Lithic Assemblages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5.  
b.Shoocongdej R., Late Pleistocene Activities at the Tham Lod Rockshelter in Highland Pang Mapha, Mae Hong Son Province, Northwestern Thailand. *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NUS Press, Singapore, pp.22-37.2006.
- [49] Forestier H., Zeitoun V., Winayalai C., et al., The Open-air Site of Huai Hin (Northwestern Thailand): Chron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Hoabinhian, *Comptes Rendus Palevol*, 12(1), pp.45-55.2013.
- [50] Forestier H., Simanjuntak T., Guillaud D., et al., Le Site de Tögi Ndrawa, île de Nias, Sumatra nord : Les premières Traces d'une Occupation Hoabinhienne en Grotte en Indonésie, *Comptes Rendus Palevol*, 4(8), pp.727-733.2005.
- [51] 同[44]。
- [52] Bowdler S., Malimup: A Tasmanian Aboriginal Hoabinhian Site in the Southwest of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n Archaeology*, 79, pp.194-202.2014.
- [53] 关于石器技术分析和技术-功能分析法研究的介绍,可参考李英华等:《旧石器技术研究法之应用——以观音洞石核为例》,《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石器研究的新视角:技术-功能分析法——以观音洞遗址为例》,《考古》2011年第9期。
- [54] a.同[11]a。  
b.同[49]。
- [55] White J. C., Emerge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 View from Prehistory, *Dynamics of Human Diversity.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pp.9-46.2011.
- [56] Marwick B., Multiple Optima in Hoabinhian Flaked Stone Artefact Palaeoeconomics and Palaeoecology at Two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Northwest Thailand,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32(4), pp.553-564.2013.
- [57] Marwick B., The Hoabinhian of Southeast Asi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Global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ie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isconsin.2013.
- [58] White J. C., Penny D., Kealhofer L., et al., Vegetation Changes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through the Holocene from Three Areas of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ailand,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13, pp.111-132.2004.
- [59] a.同[44]。  
b.Matsumura H., Oxenham M. F., Cuong N. L., Hoabinhians: A Key Population with Which to Debate the Peopling of Southeast Asia, *Emergence and Diversity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in Paleolithic Asia*.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pp.117-132.2014.
- [60] a.Higham C., Hunter-gatherer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Human Biology*, 85(1-3), pp.21-44.2013.  
b.Higham C., Thosarat R., *Early Thailand: From Prehistory to Sukhothai*. River Books.2012.
- [61] a.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柳州白莲洞》,科学出版社,2009年。  
b.吴伟鸿、王宏、谭惠忠等:《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1期。  
c.郝思德:《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文化初探》,《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d.张镇洪、邱立诚:《峒中岩、罗沙岩、黄岩洞考古发现的启示》,《西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e.Aigner J. 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Pleistocene China*. Munich: Verlag C. H. Beck.1981.
- [62] 同[49]。

(责任编辑 苗霞)